

朱士嘉的新方志学思想

扈晓冰

提要：朱士嘉是我国当代著名方志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首轮修志活动中，朱士嘉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就方志性质、新方志编纂、旧方志整理的相关问题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为当时新方志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认为，地方志是全面记载一定行政区划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著述，编纂新方志和整理旧方志都要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出发点。朱士嘉研究方志学的经验对当前新方志学的进一步发展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朱士嘉 新方志学 唯物史观 方志编纂 旧志整理

朱士嘉（1905—1989），字蓉江，江苏无锡人，我国当代著名方志学家。他于1930年在顾颉刚爱国主义教育激励与学术道路指引下跨入方志学领域，1935年以出版《中国地方志综录》闻名学界，1950年开始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对方志学进行整理和研究。1980年，社会主义新时期首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之时，朱士嘉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实践，为新方志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并因此被胡乔木赞誉为一代“方志宗师”。

新方志学，即社会主义方志学，它与封建社会旧方志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所以又被称作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我国方志学的历史源远流长，而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编纂地方志和研究方志学，还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①时至今日，经过两轮修志实践后，方志学界虽然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累了丰富的新方志编纂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但是“从严格意义上看，即使发展到今天，实事求是地看，具有规范要素和完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恐仍未真正建立”^②。就此而言，现在回头再次审视朱士嘉的新方志学思想仍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朱士嘉对方志性质的认识

1978年改革开放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新方志编纂事业再次蓬勃发展起来。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编史修志，为历史服务”的号召，全国省、市、县纷纷建立修志机构。“方志理论，是方志工作者的首要问题，尤其在编纂过程中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③因此，当时的广大方志工作者迫切需要学术理论上的指导和引领。然而，那时“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处于草创时期，一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未问世”^④。面对新方志编纂工作的现实困境，1981年2月朱士嘉在给《中国地方史志通讯》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应该辩证地看待新方志学理论与新方志编纂之间的关系。他说：“研究方志和编修方志，有区别，又有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从‘四化’建设需要出发，通过认真研究，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以此指导方志的编修工作。同时，编修方志的过程也是研究方志理论过程，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对

① 梁寒冰：《贯彻十二大精神，开创地方史志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

② 潘捷军：《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历史探索》，《中国地方志》2021年第3期。

③ 董一博：《论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31页。

④ 梁寒冰：《梁寒冰同志的讲话》，《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3期。

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环。”^①这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是首轮修志之初，朱士嘉对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而提出的建议和方法。

为了配合新方志编纂工作的开展和解决广大方志工作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初期方志学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方志名称与种类、方志起源与发展、方志性质与特点等方面。^②其中方志性质问题最受学界关注。因为方志性质问题是新方志编纂工作顺利进行的首要课题，只有“辨明了方志的科学属性，才能使所编纂的志书和其他学科著作明显区别开来，才能使所编纂的志书从它的形式到内容都符合于志书的体例和要求”^③。至民国时期，在原有争论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折衷的观点，即“方志史地兼有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方志性质问题也没得到解决。在新方志编纂工作中，对方志性质认识不清的“主要表现是尚未充分认识‘史’与‘志’的区别”^④。面对关于方志性质众说纷纭的观点以及以往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朱士嘉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方志性质问题。他说：“我国的方志，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的性质及其对不同阶段、不同制度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遵守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分析研究，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⑤

起先，朱士嘉认同的是“方志史地兼有说”。1934年他曾在《禹贡》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中说：“方志者盖即以地方为单位之历史与人文地理也。”^⑥但是，在深入研究地方志的发展历程后，朱士嘉改变了他以往的看法。朱士嘉认为，中国封建王朝国家治理的需要是地方志产生的社会基础。秦汉时期，郡县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封建王朝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往往委派外地人任地方官员。这些外任官需要详细记载当地情况的地方志作为施政参考。同时，封建王朝中央政府也需要地方志来了解地方情况。^⑦汉唐时期，地方志多称作“地记”“图经”，而不以“志”命名，内容不出地理书的范畴。至北宋时期，以“志”为名的地方志数量明显增多，地方志的发展步入成熟阶段，“其内容从‘地理’的过渡到‘人文历史’方面；人物、艺文、古迹等开始占有重要的地位”^⑧。“它的体裁已由史、书、志、记、录、传、图、经、表、乘、略等逐渐综合演变而充实，体例也日趋完备和定型。”^⑨到了清朝，我国古代地方志的编纂进入繁盛时期。“举凡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情况，在地方志中都有反映……它所记述的范围，早已渗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了。”^⑩又因为这一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内容涵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方面面的内容，方志学家就如何才能更好地把各种类型的资料系统地、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展开广泛讨论，形成了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撰著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纂辑派。但是从地方志变化发展过程中也不难看出，地方志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因此，朱士嘉对方志性质作出了新的判定，他说：

① 朱士嘉：《往来函牍》，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416—417页。

② 参见许卫平：《中国现代方志学阶段发展探论（下）》，《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期。

③ 张晓宁：《自立门户 创设新科——也谈方志性质》，《新疆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

④ 徐建：《1966年以前新修方志工作述评》，《黑龙江史志》1991年第4期。

⑤ 朱士嘉：《现存方志的收藏分布和管理利用》，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28页。

⑥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自序》，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页。

⑦ 参见朱士嘉：《中国地方志浅说》，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64页。

⑧ 朱士嘉：《谈谈地方志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2期。

⑨ 朱士嘉、黄道立：《方志与方志学》，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71页。

⑩ 朱士嘉：《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55页。

地方志，一名方志。顾名思义，是一方之志，是全面记载一定行政区划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著述，广泛涉及天文、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化等等；也就是说，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内容无不包括在内。现在人们通常称之为“地方百科全书”，实质上它是一门边缘学科。^①

朱士嘉的这一论断把地方志的著述特点、记述内容、学科属性在理论上做了概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方志从简单的地理书、历史书之争议中解放出来，从学科上谋求方志的独立，大大扩充了方志的内涵”^②。

客观地说，朱士嘉关于方志性质的界定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很精确，尤其是没有厘清志书与方志学之间的关系，将志书性质与方志学性质混为一谈。但是，朱士嘉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方志性质的方志学家。他较为科学地揭示了地方志性质并在理论上作了概括。这对在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朱士嘉指明了研究方志性质的正确方法。这对现在的方志性质研究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处于永恒变化发展过程之中的，对事物的研究要从事物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着手，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因此，解决方志性质问题必须要如朱士嘉所说，应该从地方志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有学者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三大规律之一的量变质变规律指出，事物的质长期稳定不变，变化的是事物的量。当量的变化超出一定限度，就会发生质变，原有的事物就不存在了。研究方志性质不能只考察地方志内容的变化，应该找到其长期相对稳定不变的质。^③ 其实，这和朱士嘉的观点并不矛盾。事物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对事物的质起决定作用的属性必须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确定。地方志的内容和体例虽然是不断变化的，但其根据人类社会实践需要，对一定行政区域自然与社会各方面资料进行综合性著述的属性是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的。而地方志是综合性著述的判定，正是朱士嘉在地方志变化发展过程中归纳概括出来的。这说明在地方志变化发展过程中研究方志性质时，同样需要注意“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 朱士嘉对新方志编纂的探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和关心下，1956年至1966年新方志编纂工作曾经在全国兴起过一次。1961年，周恩来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修好社会主义新的方志。”^④ 改革开放后，方志学界普遍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编纂好新方志的关键。朱士嘉说：“参加编纂方志的同志，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编纂方志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串于修志实践的过程。如果结合的好，则方志质量可以得到保证。”^⑤ 然而，应该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纂新方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处于探索之中，方志学界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朱士嘉在批判旧方志学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就如何编纂新方志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① 朱士嘉：《地方志的基础知识》，《福建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1期。

② 程方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3期。

③ 参见李殿元：《关于方志性质的再探讨》，《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

④ 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22页。

⑤ 朱士嘉：《谈谈方志的采访、体例及史志的区别》，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98—99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显著区别是它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不仅从实践的角度理解、解释现实世界，而且更强调要在实践中改造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由此出发，朱士嘉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纂新方志，其宗旨与旧方志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旨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81年6月，他在“贵州文史丛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编纂新方志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摸清或基本摸清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及其发展规律，为拟定合乎国情、合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规划提供全面、翔实、可靠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二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爱乡、爱国主义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三是为国家培养具有理论水平、专业知识、写作能力的干部队伍。^② 在这之前，有些方志学家虽然也提到编纂新方志要为“四化”建设服务，但大多都跳不出研究历史，吸取经验教训的范围。有学者说：“今天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时……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堆积如山，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的任务愈来愈重。因之，作为记录一个地区综合性资料的方志，就更不能缺少。”^③ 而朱士嘉则可以说是对新方志编纂宗旨进行全面、详细的阐释。他把编纂地方志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即人民群众，以及人民群众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都统一在了新方志的编纂意义之中，更加明确新方志编纂宗旨的内涵。从1981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上讨论的《关于新省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1982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常务理事会议一届二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等资料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在制定编纂新方志规范性文件时，有关新方志编纂宗旨的表述应该是借鉴了朱士嘉的观点。

绵延不断地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在上千年的修志实践中，历代方志学家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为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旧方志的编纂存在着很多缺陷。朱士嘉说：“在旧社会，地方志大多是官僚地主编修的，起着维护和巩固其政治的作用。它对反动集团歌功颂德、隐恶扬善，对农民起义歪曲污蔑。”^④ “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不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或对某些事实进行歪曲，或在其中混杂迷信成分。”^⑤ 与朱士嘉从编纂目的和指导思想方面指出旧方志的缺陷不同，胡乔木还进一步指出旧方志在篇目设置方面也存在缺陷，他说：“过去的地方志，别的问题且不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在各个门类之间看不出相互间的影响和逻辑关系。”^⑥ 由此可见，以往在唯心主义思想影响下编纂的地方志，意图表达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不仅在内容上有很多记述是封建糟粕，而且在各个篇目的设置上也缺乏严谨的逻辑关系，不便于读者参考利用。新方志的编纂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地方志的内容和体例进行改造，才能使之适应时代的需求，实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的。1980年4月和1981年7月，胡乔木先后提出要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新体例编纂新方志和增加新方志科学性、时代性的建议，在方志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士嘉对新方志的科学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② 参见朱士嘉、骆啸声：《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87页。

③ 刘永之：《修志刍言》，《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1期。

④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浅说》，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69页。

⑤ 朱士嘉：《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57页。

⑥ 胡乔木：《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几个问题》，《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2—233页。

我所理解的科学性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正确地反映广大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贡献。把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各种物质生产活动放在第一位；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思想活动放在第二位。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找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演变发展规律。^①

朱士嘉对新方志科学性的认识是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理解而得出来的。新方志的编纂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自觉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立言，不仅能够还原在旧方志中被封建统治阶级歪曲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能激发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从而使人民群众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按照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顺序妥善设置方志篇目，不仅使各个篇目之间在逻辑上具有关联性，而且“使人们容易了解事物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以便后人进一步综合分析，比较研究，探讨事物的规律性”^②。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由此可见，朱士嘉理解的新方志科学性中包含着胡乔木主张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新体例编纂新方志的部分内容。

编纂新方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条件，有赖于全面、翔实、可靠的资料作为支撑。因此，朱士嘉十分重视资料搜集工作。他说：“全面开展资料搜集工作这个战役，关系到修志的成与败，质量的优和劣，很重要。”^③朱士嘉在研究清代学者顾炎武、章学诚、钱大昕等人方志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方志编纂工作的需要，指出通过网罗旧志、选辑档案、征采金石碑刻、实地考察广泛搜集资料时，需要多加留意3种资料：一是老革命家、老干部、老工人、老农民、老艺人、老科学家、老知识分子、老知情人（各行各业）的口述资料。^④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需要抓紧抢救，以免与之失之交臂。二是外文资料。“过去，来华的外国人很多……其中有些是来华旅行、探险、考察，并且留下了许多资料。”^⑤这些资料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一些历史事实，很有参考价值。三是反面材料。“反面材料之中有时存在正面的东西。”^⑥“以前修志只知道顾全‘体面’，以为这些材料都是有伤风化的……他们不懂得改革社会，必先调查其病象之所在，然后研究病根，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等地搜集地方志资料的经验来看，少数人是无法完成资料搜集工作的。^⑧长期身居武汉的朱士嘉应该对此有深入了解，于是他又说：“通过发动群众对一定行政区划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情况进行深入的普查，并把普查得来的一切资料进行审核，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写出一部反映真实情况的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方志。”^⑨由此可见，朱士嘉认为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新方志内容记述的基本立场，更是开展新方志编纂工作的根本原则。

① 朱士嘉：《祝贺与希望——为〈武汉春秋〉的诞生而作》，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305页。

② 朱士嘉：《对〈通城县志〉提出几点意见》，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288页。

③ 朱士嘉：《学习顾炎武“锲而不舍”的精神 决心修好武汉地方志》，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08页。

④ 参见朱士嘉：《往来函牍》，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417页。

⑤ 朱士嘉：《关于编纂江河志的几个问题》，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47页。

⑥ 朱士嘉：《评李兆洛所纂〈凤台县志〉》，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270页。

⑦ 朱士嘉、骆啸声：《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95页。

⑧ 参见王张强：《浅述1956—1966年中国新方志的编纂规划、模式及程序》，《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1期。

⑨ 朱士嘉、骆啸声：《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89页。

三 朱士嘉对旧方志整理的思考

20世纪30年代,朱士嘉在陈垣的影响下开始了对地方志目录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①他利用5年时间,调查全国50余家公私图书馆的地方志收藏情况,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是书体例和编辑方法为前人所未有,其体制之精,规模之巨,著录量之多,皆为以往所不及。此书出版,标志着中国方志目录学正式创立。”^②朱士嘉可以说是为地方志目录学的发展作出突破性贡献,但是当时他对编辑地方志目录的认识还仅限于为其他人做学问提供方便上,即“研究或利用地方志的人,可以各尽所能,以求其材料之完备……修志的人,据此以求其所见的志书,作为蓝本……图书馆,藏书家据此可以有置备志书的标准……如果把它列成一个地方志年表,可以推知历代修志的成绩,文化的转移,政治势力的消长。”^③

1954年,苏联援建我国工矿单位时要求预先调查建设地点的地震烈度。然而,当时我国地震台站不仅站点少而且建设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无法提供满足建设所需要的地震数据。李四光提议利用历史资料来制订拟设厂矿地址的地震烈度。^④由于地方志是记载地震历史资料的主要文献之一,所以《中国地方志综录》在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编写《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使朱士嘉认识到编纂地方志目录不仅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而且还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另外,朱士嘉此时还发现,《中国地方志综录》在1935年出版后,地方志的馆藏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该书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有必要对其进行增订。^⑤1955年至1958年,朱士嘉在范文澜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对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28家图书馆馆藏地方志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增订《中国地方志综录》。同时,朱士嘉也对编纂地方志目录的作用进行新的阐释。他指出,读者根据地方志目录“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参考的地方志,再从地方志里找到所要寻觅的气候、地理、地质、农业、手工业、水利……等资料。这些资料,经过精密的鉴定、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分析后,可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⑥。

1974年底,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共同召开了整理研究祖国天文学规划座谈会,会议决定开展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天象记录的工作。^⑦在对地方天文资料进行普查过程中,《中国地方志综录》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中国天文史料普查整理组”也认识到现如今“很有必要重新编辑一部更加完整的反映现实藏书情况的地方志联合目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⑧。1976年至1978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组织全国190个藏书单位参加,在《中国地方志综录》的基础上编制《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作为主编之一,朱士嘉参加并指导该书的编辑工作。《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现存方志8200余种,是目前我国最为完整、最为系统的全国性方志总目。但是,该书只著录了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

① 参见李泽:《朱士嘉先生传》,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464—465页。

② 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06页。

③ 朱士嘉、顾颉刚:《研究地方志的计划》,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41—42页。

④ 参见竺可桢:《〈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序言》,《竺可桢全集》第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23页。

⑤ 参见朱士嘉:《我与商务印书馆》,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408页。

⑥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自序》,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4页。

⑦ 参见钱三强:《序》,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⑧ 参见洪斯溢:《前言》,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藏书单位等项目，而没有编写志书提要。朱士嘉指出，关于旧方志的提要虽然有《四库全书提要》和《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可以参考，“但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衡量，就觉得有许多应予补充、修改甚至重写的必要。希望提要着重介绍和分析与四个现代化关系比较密切的资料，提供读者参考，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①。除此之外，朱士嘉早在1931年就已认识到地方志目录只编辑全国性的总目是不够的。地方志篇目繁杂，翻检不便，如果根据方志篇目编制图表或索引，将会极大提高查找资料的效率。他说：“有了总目，可以知道志书之所在，有了篇目，可以知道材料之所在，然后书城万卷，可以恣我饕餮，不至于尘封卷面，蠹殖书缝了。”^②改革开放后，朱士嘉又进一步指出：应该根据方志篇目编写各种专题书目，例如地理书目、水利书目、农业科学书目、医药学书目等。^③

在长期从事旧方志整理研究工作中，朱士嘉深深体会到旧方志资料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1978年，他给胡乔木、方毅写信建议对旧方志进行整理，以为“四化”建设服务。^④在这之后，他又多次写文章阐述整理旧方志的方式方法。朱士嘉指出，整理旧方志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地方志中经济资料进行系统的重点整理，但并不排除具有地方和时代面貌的其他资料的整理工作”^⑤，但是因为时代、阶级以及科学水平的局限，旧方志中难免会有反动、迷信、失实之处。“这就需要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⑥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发挥整理旧方志服务科研、服务现实的作用。因此，整理旧方志时要注意资料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朱士嘉说，“整理资料，要注意全不全，准不准，尽量找第一手资料，找原始记录。往往同一种记录，转辗翻刻，愈后出者讹误愈多。同一事物有不同记录者，则宜旁搜博访，进行考证，说明情况。”^⑦为了保证资料真实可靠，朱士嘉还提出要重视实地调查研究。他说：“整理旧志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整理出来的资料，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说服力。因为流传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口碑和散见于城乡各处的实物、碑铭，往往可补一般资料的不足，纠正一般资料的遗误。”^⑧

余 论

目前，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已基本上进入收官阶段，第三轮修志工作启动在即。如何解决第二轮修志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问题，是事关实现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目标和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重要课题。朱士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方志学的经验和成果对今后的新方志编纂工作主要有三方面启示：

第一，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切实发挥新方志服务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作用。“近40年来，方志正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方志越修越多、越修越厚，但却越

① 朱士嘉：《整理研究地方志之我见》，《人文杂志》1979年第2期。

② 朱士嘉、顾颉刚：《研究地方志的计划》，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42页。

③ 参见朱士嘉：《应该十分重视地方志的整理研究工作》，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中国地方志总论》，吉林省图书馆，1981年，第160页。

④ 参见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第854页。

⑤ 朱士嘉：《关于旧志整理工作的设想》，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92页。

⑥ 朱士嘉：《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57页。

⑦ 朱士嘉：《关于旧志整理工作的设想》，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94页。

⑧ 朱士嘉：《关于旧志整理工作的设想》，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194页。

来越没有读者。”^① 编纂新方志作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关心的一件大事。然而，读志、用志的群体不见增多反而减少，这说明新方志编纂的广度和深度满足不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朱士嘉说：“通过社会主义方志的编写，继续发扬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只有这样，才能把各项建设规划建筑在可靠数据的基础之上，才有利于普遍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创造条件。”^② 由此而言，各地、各级地方志机构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了解党和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调查本行政区内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真实可靠的数据，并以此为基础编纂新方志才能真正满足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志、用志。

第二，与时俱进，编纂新方志要紧扣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精神。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多样化的特征日益明显。然而，“这些多样化，特别是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在志稿中反映很不够，可以说是当前志稿中普遍存在的薄弱环节”^③。由此可见，有些志书的编纂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不能充分反映出时代精神。朱士嘉指出：“新的时代、新的历史、必赋予方志新的品质。”^④ 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问题。新方志的编纂应该聚焦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精神，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从内容和篇章设置上进行调整，为人们了解、分析、解决时代问题提供帮助。只有这样，才能使新方志的品质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高，进而使新方志学能够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编纂新方志。前文中提到，有一部分第二轮志书的编纂没能反映出时代特色。有些学者指出，其原因在于资料搜集不全，存在缺项断线。第二轮修志所涉及的领域较首轮修志更多，而有些地方志机构仅依靠政府向各单位（部门）布置任务，靠各单位（部门）上报材料。“这样做的好处是广泛搜集了党委、政府、国有企业的资料，内容丰富，但是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市场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的资料却很欠缺，经常出现大量缺失。”^⑤ 朱士嘉说：“只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来关心，给予大力的支持并展开社会主义大协作，才能在不远的将来，编纂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新方志，为提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⑥ 由此而言，新方志编纂工作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只有方志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通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普查资料，依靠方志工作者承担校订资料、编纂方志的具体工作，才能编纂出一部真正反映时代特点、地方特点、符合社会各方面需要的高水平的地方志。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耿俊杰：《方志哲学》，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页。

② 朱士嘉、骆啸声：《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87—88页。

③ 许还平、陈浩：《对第二轮修志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3期。

④ 陈昕：《择善而固本 上下而求索——朱士嘉先生爱国奉献精神的启示》，邵文杰主编：《当代中国志坛诸老纪念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26页。

⑤ 刘丹：《第二轮修志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广西地方志》2014年第4期。

⑥ 朱士嘉：《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修志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第324页。